

# 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下云南泸沽湖湖滨带 “三生”功能演变特征与机制

刘宏芳, 王佳莹, 赵颖

(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高原湖泊湖滨地带不仅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活动的密集区域,也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带,更是“三生”功能演变的典型区域。本文以云南泸沽湖为例,剖析在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二维驱动作用下其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的特征,并探讨其背后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高原湖泊湖滨区域因高原山地主导的地形特征,形成“地形约束—生态敏感”的双重制约机制,迫使空间演变需在保护优先框架下通过“微更新”实现;(2)旅游发展初期生活空间主要保障居民生活、居住、交往的核心功能;生产空间主要以农耕畜牧为主;生态空间保留原生“森林—坝子—湖泊”系统,呈现自然基底主导格局;(3)旅游高速发展期生活空间向“旅居”融合化与服务化转变,生产空间向旅游景观化转变,生态空间向功能复合化与活动多元化转变;(4)生态治理转型期湖滨带生活空间商业化、现代化、同质化且主体性弱化,生产空间园林化、景观化且增值功能与保护功能冲突;生态空间扩大化、改善化但人工景观化明显;(5)泸沽湖湖滨带“三生空间”演变是自然环境、旅游市场需求、政策规制、利益主体行为博弈多因素交织驱动的结果。研究可补充微观层面生态治理的案例研究,为发展与保护二元目标下的高原湖泊科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三生空间”;高原湖泊;地形约束;生态敏感;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 X321;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210-(2026)02-116-11

## 一、引言

“三生空间”是依据区域产品和服务功能对其进行划分,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类空间的总称。生活空间是人们居住、消费和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承载、物质和精神保障功能;生产空间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载体,以提供工农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要功能;生态空间是维持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本底,以提供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和生态防护为主要功能<sup>[1]</sup>。“三生空间”不仅是由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有机组成的复合空间,本质上是不同人类行为活动相互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是生产、生活、生态行为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共同表征出的复杂空间<sup>[2]</sup>。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家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生态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领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湖泊作为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核心战略区域<sup>[3]</sup>,其湖滨带作为水域和陆地的交错带<sup>[4]</sup>,起到过渡与净化作用,对湖泊和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承载着生态、生活、生产的“三生”功能。高原湖泊地区因其高海拔属性、生态系统敏感性及环境脆弱性,其周边聚落的“三生空间”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与严峻态势。云南泸沽湖作为典型高原山地地貌与湖泊流域复合形成的特殊地理单元,在纬度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规律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山区与湖泊流域融合的独特地理空间,既具备显著的生态保护价值,又因生态系统敏感性高而极易受外界干扰。加之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限制,相较于东部平原湖泊区域,高原湖泊在市场辐射能力、人口聚集规模、聚落发育程度以及发展周期的初始条件、演进速率与持续性等方面有自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61038, 42561041);“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专项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4Y57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ZK2024ZD02)。

**作者简介:**刘宏芳,博士,副教授,从事旅游管理、文化地理研究。

**引用格式:**刘宏芳,王佳莹,赵颖.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下云南泸沽湖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特征与机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26,43(2):116-126.

身的独特性。旅游产业发展一方面为当地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被视作生态保护的障碍,故而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政策。基于此,本文选择云南泸沽湖湖滨带为研究对象,剖析在旅游开发与生态治理二维驱动作用下该区域“三生”功能演化的特征,并同步探究“三生”功能变迁的多维驱动要素及作用机制,以期有效促进高原湖泊旅游区域的空间可持续更新与科学利用。

## 二、相关文献回顾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载体,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宏观全貌<sup>[5]</sup>。近年来,“三生空间”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国内主要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国土开发和乡村振兴等领域,其研究内容涵盖“三生空间”的逻辑关系<sup>[5]</sup>、内涵辨析<sup>[6]</sup>、时空格局演变特征<sup>[7]</sup>、耦合协调发展<sup>[8]</sup>、空间重构与优化<sup>[9]</sup>、适宜性评价<sup>[10]</sup>、功能空间识别<sup>[11]</sup>、生态环境效应<sup>[12]</sup>等方面。国外研究虽鲜见旗帜鲜明的“三生空间”研究成果,但亦有研究对空间土地功能间的联系及其产生效应<sup>[13]</sup>、“三生空间”耦合及影响因素分析<sup>[14]</sup>,以及“三生空间”的功能类型划分<sup>[15-16]</sup>予以关注。研究方法多集中于数据统计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与定量指标;研究范围逐渐从全国、全省宏观尺度<sup>[17-18]</sup>向市域、县域、流域、村域的中、微观尺度<sup>[19-23]</sup>过渡,研究对象较多关注城市群<sup>[24]</sup>、资源密集区<sup>[25]</sup>、传统村落<sup>[1]</sup>、旅游城镇化地区<sup>[26]</sup>等地域单元,但鲜见自然保护区等较微观层面的研究。

湖泊作为我国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其“以水为基”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与“依水而兴”的生产生活模式,使得“三生空间”格局转型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与差异性<sup>[3]</sup>。而高原湖泊是由典型高原山地、坝区与湖泊复合形成的特殊地理单元,其空间结构受纬度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规律双重塑造,因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生物多样性价值,形成兼具高生态保护意义与环境脆弱性的独特地理空间<sup>[27]</sup>。相较于平原湖泊湖滨带,两类区域在“三生空间”格局与功能演变上是否存在差异亟待探讨。基于此,本研究从旅游发展进程与生态治理实践的双重视角出发,采用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法,以云南泸沽湖这一高原湖泊为实证分析对象,重点关注云南泸沽湖湖滨带及周边环湖大落水、吕家湾、三家村、菴放、普洛、里格、小落水等自然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情况,系统剖析旅游活动演进与生态治理举措对“三生”功能变迁的影响,总结其“三生”功能演变的过程与特征,解析其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以期更好地推动高原湖泊旅游空间有机更新和科学利用。

## 三、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范围

研究选取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的云南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云南泸沽湖”)湖滨带作为研究区域(图1),湖滨带是陆地与湖泊之间的缓冲带<sup>[28]</sup>,本研究主要聚焦湖滨区域范围自泸沽湖水岸线延伸至山体基部的空间,具体起始点依次为小落水、尼寨、里格、小渔坝、大落水、三家村、吕家湾、菴放、普洛。泸沽湖为典型的高原断层溶蚀湖泊,总面积达8 133.0 hm<sup>2</sup>,不仅拥有充沛的水资源,且周边地势相对平坦,是聚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在“山—地—村—湖”这一空间格局中,泸沽湖湖滨带的保护与利用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矛盾。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泸沽湖旅游开发逐步兴起,并经历了从萌芽、探索到规模化、商业化以及后期的生态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自2018年起,为加强泸沽湖周边生态治理,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的泸沽湖沿湖小落水、尼寨、里格、三家村、吕家湾、普洛、菴放等村落相继实施了搬迁计划(大落水村因其为中国传统村而未搬迁)。鉴于此,本研究从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二维驱动的视角出发,深入探究泸沽湖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的特征,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其变化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以期对相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团队先后于2023年11月7日至15日、2024年5月

8 日至 13 日在云南泸沽湖及周边村落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考察,对政府工作者 9 名(civil servant, 编号 CS1~CS9)、民宿经营者 4 名(B&B operator, 编号 BO1~BO4)、餐饮工作者 7 名(caterer, 编号 C1~C7)、划船工作者 8 名(rouer, 编号 R1~R8)、摩梭文化博物馆馆长和非遗文化馆馆长 2 名(museum curator, 编号 MC1、MC2)、村民 4 名(villager, 编号 V1~V4)、索道投资商 1 名(ropeway investor, 编号 RI1)共 35 名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表 1),每人访谈时长均在 0.5~1.5 小时,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问询旅游发展历程、湖泊周边空间变化及功能演变情况、生态治理政策、村民旅游感知、参与情况及环境变化情况等。调研区域覆盖了所有滨湖村落。文本分析则主要通过系统搜集与整理地方志、泸沽湖旅游规划文本以及泸沽湖“80 米生态红线搬迁”等生态治理政策网络资料,并结合实地调研信息交叉验证,从旅游开发与生态治理双重视角剖析泸沽湖“三生”功能演变的过程与特征、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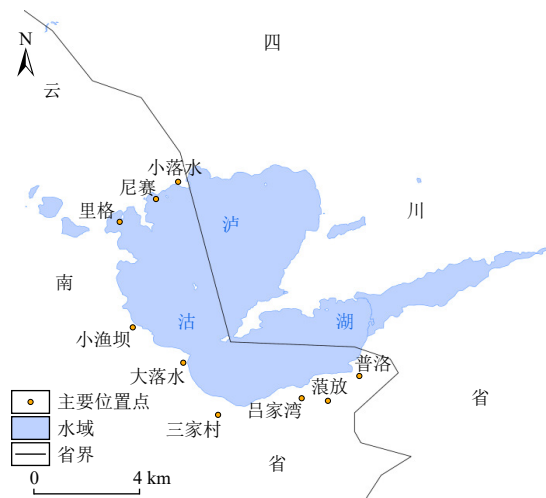


图 1 云南泸沽湖及周边村落地理位置示意

表 1 泸沽湖周边村落访谈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职业	访谈时间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职业	访谈时间
CS1	男	42	王家湾村村长	2024.5.9	C1	女	37	大落水村餐馆老板	2024.5.12
CS2	男	52	普洛村村长	2024.5.9	C2	男	36	里格村饭店老板	2024.5.12
CS3	男	33	吕家湾划船小组长	2024.5.10	C3	男	37	里格村饭店员工	2024.5.12
CS4	女	30	大落水村村委副主任	2024.5.10	C4	男	35	里格村饭店员工	2024.5.12
CS5	男	40	竹地汉族村村长	2024.5.13	C5	男	28	小渔坝餐馆员工	2024.5.10
CS6	男	36	山垮村村长	2024.5.13	C6	男	36	里格村饭店老板表哥	2024.5.12
CS7	男	37	小落水村村长	2023.11.10	C7	男	34	咖啡店老板	2024.5.13
CS8	男	40	吕家湾村长	2023.11.9	R1	女	49	菴放村划船工作者	2024.5.8
CS9	女	31	小落水村公职人员	2023.11.11	R2	男	53	王家湾划船工作者	2024.5.9
BO1	女	31	王家湾民宿工作者	2024.5.9	R3	男	35	普洛划船工作者	2024.5.9
BO2	男	33	菴放村民宿老板	2024.5.10	R4	男	30	三家村划船工作者	2024.5.10
BO3	男	40	尼塞民宿老板	2024.5.12	R5	女	47	吕家湾划船工作者	2024.5.10
BO4	男	39	小落水民宿老板	2023.11.11	R6	男	35	三家村划船工作者	2024.5.10
MC1	男	47	大落水村摩梭博物馆馆长	2024.5.13	R7	女	27	小落水划船工作者	2024.5.12
MC2	女	49	温泉村非遗文化馆负责人	2023.11.13	R8	男	28	三家村划船工作者	2023.11.12

表 1 (续)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职业	访谈时间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职业	访谈时间
V1	男	30	里格村村民	2024.5.12	V2	男	28	里格村卖土特产	2024.5.12
V3	男	31	三家村村民	2023.11.10	V4	女	28	小落水村民	2023.11.11
R11	男	35	索道投资商	2023.11.14					

### (三)阶段划分说明

本文将研究区内旅游发展阶段划分为旅游发展初始期(1980—2004年)、旅游高速发展期(2005—2017年)、生态治理转型期(2018年至今)三个阶段,分别对泸沽湖湖滨带不同时期“三生空间”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该划分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泸沽湖旅游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过路的车辆接待。改革开放后,泸沽湖涌入了大量人流、物流、信息流及能量流,以上流动要素成为打破该地区原有封闭状态、推动其开放发展的关键力量,且泸沽湖周边社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sup>[29]</sup>,由以往的农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旅游经营为主、农牧为辅的状态。(2)2005—2017年,泸沽湖展开了全面的环境整治和提升计划,着力推进“八大工程”的落实,并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管理体系的完善。这使得泸沽湖周边的设施和村落面貌焕然一新,众多村落开始涉足旅游服务行业,纷纷建设客栈和民宿<sup>[30]</sup>,导致湖滨带的功能发生了显著转变。(3)2018年至今,随着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及泸沽湖生态治理的深入开展,泸沽湖作为云南高原湖泊的典型代表,受到高度重视,一系列生态治理的政策在泸沽湖落地实施,促使泸沽湖及周边旅游村落进入生态旅游发展的调整与适应阶段。

## 四、泸沽湖“三生”功能演变特征分析

### (一)旅游发展初始期(1980—2004年)

#### 1. 生活功能以居民居住交往为主

20世纪80年代泸沽湖旅游业起步时,空间格局相对单一,湖滨带主要由居民的生活、生产及生态空间构成。生活空间以民居建筑为主体,村庄建设用地扩张进程缓慢,房屋主要以全木结构木楞房为主,采用榫卯穿斗工艺实现无金属构件连接,空间布局呈现底层畜养、中层人居、顶层仓储的垂直分层特征<sup>[31]</sup>。一位大落水餐馆老板娘(编号C1)表示:“大落水村最开始的收费就是10块20块的,当时住的下面都是养猪养牛的,客人就在上面睡。然后一起住一起吃饭的,关系也挺好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初步发展旅游时湖滨的生活空间以初始功能为主,承担着保障居民生活、居住、交往的核心功能,以及少量与游客的主客交往,外来干预较少。

#### 2. 生产功能以农牧为主

在旅游发展初期,泸沽湖生产空间主要包括耕地、牧场等,周边森林也是其采集食物、药物的对象。泸沽湖周边土地利用基本以种植为主。据《宁蒗彝族自治县志》记载:“沿湖村庄错落,田地丰饶,稻谷、玉米、燕麦、荞子相间……,是高原鱼米之乡。”受地理阻隔影响,泸沽湖与外界交流有限,生产活动呈现自给自足特征,畜牧以高原牛、羊、马、生猪养殖为主,农业以种植大麦、小麦、稗子、燕麦、洋芋、豆类等作物为主,产业结构单一<sup>[31]</sup>,有村民(编号R1)表示:“现在开发比以前好很多,以前只能打鱼、种地、养牛养猪。以前森林里面可以采松茸、羊肚菌等,还可以挖百部、重楼等中药材。”此时旅游业尚处于培育阶段,湖滨区域的生产空间以传统农耕、畜牧养殖和渔业捕捞为主,村民的生计渠道以传统方式为主。此时的生产空间与自然生态系统密切融合,农牧渔业是当地生产方式的重要环节,生产空间也覆盖了整个山林、土地、水体,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摩梭地方性知识与生存智慧。

#### 3. 生态功能遵循自然演化规律

在泸沽湖旅游开发初期,其湖滨的生态空间维持着自然演化的原生状态,以“森林—坝子—湖泊”生态

系统为基底, 植被以生态林为主。据《宁蒗彝族自治县志》记载: “自然保护区共有林业用地 69 495 亩, 森林覆盖率为 47.6%。林种以云南松、冷杉、高杉松为主, 有部分原始森林, 大部分属于中幼林。” “全县经济林多为零星种植, 以当地桃、李、花椒和黄果为主。从 1984 年起到 1990 年或稍后, 全县建成了 3 万亩梅子, 3 万亩花椒, 5 万亩苹果基地。” “泸沽湖是由断层陷落而形成的高原湖泊, …… , 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 自然环境所受破坏较小。” 本阶段泸沽湖生态空间以自然主导为主, 旅游产业虽已起步, 但旅游设施新建极少, 旅游活动对生态空间的干预亦较少, 整体维持着较为完整的自然基底。

(二) 旅游高速发展期(2005—2017 年)

1. 生活空间向旅居融合化与服务化转变

在村民追求高品质现代生活及旅游业带来的发展机遇等因素的推动下, 湖滨区域的生活空间功能在本阶段经历着从“生活场域”向“旅游消费场景”的转化过程, 生活功能逐渐减弱, 而旅游功能日益凸显。村民依托自有住宅拓展建设客栈、餐饮等旅游接待设施, 使民居内部空间转化为旅游服务场所。数据显示, 2005 年大落水村已具备 3 500 张游客接待床位; 至 2009 年末, 该村旅馆数量增至 75 家, 床位总量突破 4 000 张。自 2010 年起, 大落水村凭借旅游业的高速发展, 崛起为泸沽湖区域旅游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并逐步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辐射带动三家村、里格村、小落水村等周边村落旅游发展<sup>[30]</sup>。在此过程中, 原本服务于居民与游客社交需求的广场、步道等场所, 演变为兼具生活服务与旅游体验的复合型空间, 实现了传统生活场景与旅游功能的有机融合, 形成旅居一体化的空间形态。

2. 生产空间向旅游景观化转变

泸沽湖湖滨带的生产空间的功能由传统农业、畜牧业、渔业向旅游经营、服务转型调整, 在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向旅游用地转变。在人口扩张和旅游发展的驱动下, 大量耕地被建设用地侵占, 泸沽湖湖滨带周边的落水村由于游客流量的增加, 村民利用耕地新建不少建筑, 以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需求<sup>[32]</sup>。通过分析 2004 年、2010 年及 2018 年三个时期的大落水村、里格村、三家村历史影像资料(如图 2~4 所示), 可见早期的大落水村、里格岛、三家村都仅有 10 多户家庭, 村落建筑分布相对分散, 2010 年旅游业崛起后,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需求驱动村落空间重构, 原有农耕地逐渐演化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商业建筑载体, 建筑群开始向湖滨带大规模扩张。随着泸沽湖游客量的逐年增加, 至 2018 年, 旅游开发强度进一步加大, 沿湖耕地被大规模转化为旅游商业用地, 耕地面积呈断崖式缩减, 建筑体量密集衔接, 形成了由分散向沿湖地区集聚的空间布局形态<sup>[33-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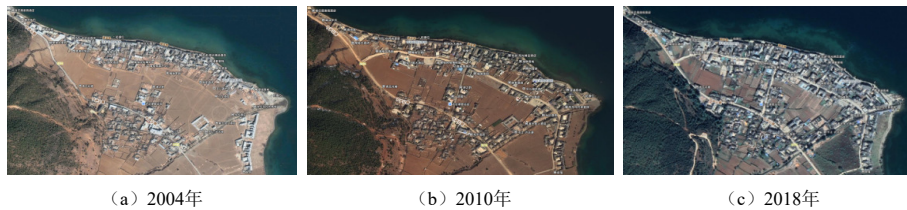


图 2 大落水村村落建筑时空演变示意

(影像来源: 奥维互动地图)



图 3 里格村村落建筑时空演变示意

(影像来源: 奥维互动地图)



图 4 三家村村落建筑时空演变示意

(影像来源:奥维互动地图)

### 3. 生态空间向功能复合化与活动多元化转变

泸沽湖湖滨区域的生态空间由自然调节向功能复合化与活动多元化演变, 泸沽湖的林地、灌木、耕地及草地等生态用地占比高达 71%, 构成天然的生态屏障<sup>[35]</sup>, 这些滨湖生态空间不仅承担着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基本生态服务功能, 更因旅游业快速发展产生显著转变, 有村民(编号 C1、MC1、BW1)表示: “以前一家一户有一匹马, 让客人在码头湖边骑着马, 边骑边听我们讲解摩梭文化。” “我们村以前自己有组一个车队, 去带客人环湖。” “以前我们可以到山上找找草药, 捡捡菌子。” 这种转变反映出旅游需求驱动下的空间功能拓展: 沿湖骑马观光功能和少量的徒步旅游功能; 传统以采集野生菌菇、草药为主的生活资料活动转变为兼具游览观光、文化体验等活动, 最终使湖滨带形成生态保育与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 (三) 生态治理转型期(2018 年至今)

##### 1. 生活空间商业化、现代化、同质化, 主体性弱化

在生态治理转型阶段, 泸沽湖的生活空间正经历着深刻嬗变。80 米生态搬迁管控政策实施后, 部分村民得到生态搬迁补助后仍旧投身于旅游业, 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给旅游经营者用于新建民宿, 但受分户政策限制, 仅能保留 2 至 3 间自住房, 其余空间逐步转化为旅游配套服务区, 居民生活空间的居住功能逐步让步于商业开发。同时, 各村落的临湖建筑由专业机构统一执行规划建设, 要求临湖建筑外立面必须添加木制元素, 虽实现形式统一, 却导致摩梭文化元素缺失, 建筑风格呈现明显的现代化、同质化特征。村民(编号 BW2)表示: “2015 年以前的建房风格是比较自主的, 2017 年之后规定所有房子都必须加上木制元素, 也就是外立面你们看到的要包木头了。” 同时, 因生态管控, 具有民族特色的码头被拆; 三家村篝火场地等公共活动空间遭综合执法队清理, 导致红白事等民俗活动失去载体, 这些变化压缩了居民日常交流空间, 也削弱了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在规划强制与商业需求双重压力下, 村民被迫服从标准化建设要求, 自主性弱化, 传统建造智慧与文化表达空间被压缩, 原本多元的生活空间逐渐演变为功能单一、文化符号单一的旅游服务区, 形成“千房一面”的空间格局。

##### 2. 生产空间园林化、景观化, 增值功能与保护功能冲突

2018 年泸沽湖启动“湖滨生态廊道”工程将自然岸线改造为混凝土护岸与木栈道系统, 80 米生态红线内步游道两侧的景观绿化带占用了原有耕地与牧场, 通过新一轮的植树、种草等统一改为人工绿化带, 这种空间生产强化了湖岸线的生态缓冲功能, 同时构建了新的游客步行空间, 景观消费功能得以增强, 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园林化、景观化。有村民(编号 CS1、CS4、C2、BW3)认为: “湖边的绿化带搞成了公园式的, 一些天然的植被消失了, 生态廊道绿化带布局像城市公园。” “这里的码头、80 米范围内原本是耕地, 现在被弄成了绿化, 感觉改完还不如之前好看, 并没有很美观。” “以前里格也只有四五户人, 现在我们在的这片区域(里格半岛湾内的一条街)本来就是农地、牧场。” “80 米的湖滨绿化带以前是农地。” 依据 2023 年颁布的《云南省泸沽湖保护条例》规定: “生态保护核心区禁止搭棚、摆摊、烧烤、野炊、露营”,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或者设施”。同时, 搬迁了吕家湾、普洛等一些村落的临湖停车场。多位村民(编号 R3、CS2)都表示: “码头那边不允许卖东西, 送饭过去也没办法热, 苹果不让卖, 单单让划船, 卖东西的话就把人抓起来喽。自己种点花椒、梨子, 也没有办法卖的。” “以前是可以摆摊的, 现在 80 米以内完全不允许有任何经

营活动,以前来卖东西的人还多。”此类空间管制措施实质上压缩了客源密集区的高价值空间,挫伤了黄金商业空间的经济开发潜能,导致当地居民对生产空间增值功能与生态刚性保护功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原本临湖居住空间出租收益高,但搬迁后收益大幅下降;原本的耕地、牧场变为生态廊道绿色空间后,便无法再加以利用。

### 3. 生态空间扩大化、改善化, 但人工化倾向明显

泸沽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需求促使湖滨带生态空间扩大化,且有显著改善,但同时人工化干预倾向明显。有村民(编号 BW1)表示:“整体生态环境确实优化许多,以前牛马放到山里,看得一清二楚。现在钻进去,你看不见的,因为树多了。以前发大水,泥水冲到家里来,现在基本不会了”。可见森林生态空间确实得以显著优化改善,但传统经营性空间如临湖停车场、码头等被纳入生态廊道建设,这种景观化改造虽可能提升游客体验,但生态红线区域的植被修复有明显的人工干预痕迹,原生柳树林、芦苇群落被修剪整齐的观赏草坪取代,过度强调规则式造景与外地植物引入,生物群落趋向同质化,使本应呈现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为单调的人工景观展示品。

综上,高原湖泊湖滨区域因高原山地主导的地形特征,形成“地形约束—生态敏感”的双重制约机制,迫使空间演变需在保护优先框架下通过“微更新”实现。作为典型高原湖泊的泸沽湖,受山地地形限制,其乡村人口聚集规模较小、旅游资源禀赋形成的产业基础较弱、旅游发展生命周期增速较缓且起点较低,发展阶段尚未抵达增长峰值便受到生态治理措施的约束;同时,政策执行主体与当地居民利益主体因各自利益产生矛盾博弈,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塑造泸沽湖区别于其他区域的“三生空间”演变特征。

## 五、泸沽湖“三生”功能演变驱动机制分析

过往研究显示,湖泊湖滨区域的“三生空间”演变是自然环境、区位可达性、社会经济、工业化、政策调控、主体博弈与民族文化多要素交织作用的结果<sup>[22, 26-27, 36]</sup>。从泸沽湖的具体情况来看,自然环境构成基础性约束,高原山地陡坡与曲折湖岸线直接压缩村落扩张空间,地形分割效应导致交通成本攀升,长期制约资源流动效率与经济联结强度,从而限定“三生空间”的基本格局;旅游市场需求作为核心驱动力量,通过产业发展与需求升级推动空间功能向多元化、复合化转型;政策调控则通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对泸沽湖湖滨带开发利用进行引导与规制,成为空间演变态势的关键变量;利益主体的行为与博弈则构成推动“三生空间”动态调整的核心动力机制(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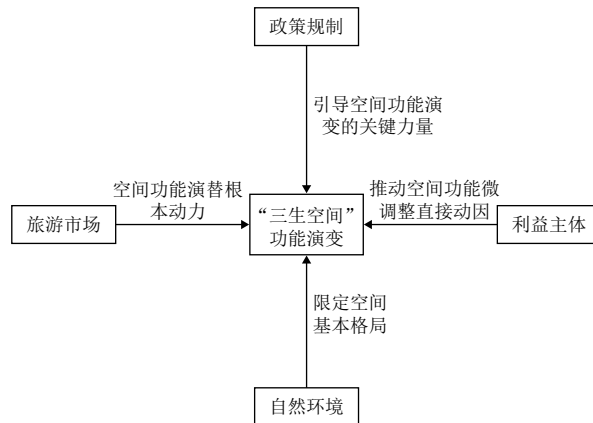


图 5 泸沽湖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驱动机制

### 1. 自然地理环境限定了湖滨带“三生空间”的基本格局

泸沽湖的自然环境从多维度塑造了湖滨区域“三生空间”的基本格局。地形地貌作为空间格局的基础

框架,在旅游发展初期深刻制约着“三生空间”的分布,周边陡峭地势与曲折湖岸线共同构成“山原峡谷—湖盆—冲积扇”的立体空间结构,促使居民生活空间向河谷地带集聚,生产空间覆盖了整个山林、土地、水体,生态空间呈现“森林—坝子—湖泊”体系结构,通过自然植被带与农田系统的有机衔接,形成了具有高原湖泊特色的生态保护格局。同时高原显著的气候垂直变化促使畜牧业形成以高原牛、羊、马、生猪为主的养殖结构,农业则发展出适应高寒环境的大麦、小麦、稗子等耐寒作物种植体系,还催生了独特的建筑适应模式,湖滨带传统民居采用底层畜养、中层人居、顶层仓储的三层垂直布局。在旅游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受地形坡度影响,里格、大落水、三家村等村落的建筑群沿湖岸线呈线性延伸扩张。同时,泸沽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旅游需求持续攀升。

## 2. 旅游市场需求是湖滨带“三生”功能演替的根本动力

旅游市场需求作为外部驱动力,深刻重塑了泸沽湖湖滨带“三生空间”的功能演替与空间形态。在旅游发展初始期,市场需求规模较小,游客数量少、消费能力低,但已开始影响空间功能微调,彼时传统木楞房在保留居住功能的同时开始嵌入简易餐饮、住宿服务,底层畜养空间逐渐转化为游客体验区;虽市场需求有限,生态空间维持原生基底,但已出现早期生态旅游行为,如游客雇佣村民马匹进行环湖骑行,为后续生态空间功能拓展埋下伏笔。当泸沽湖进入旅游高速发展期后,游客量激增直接推动空间功能转变,生活空间呈现显著的旅居融合特征,传统居住功能与旅游接待功能深度融合;生产空间彻底转向旅游服务导向,农业与畜牧业逐步让位于商业服务设施;生态空间在骑马观光、徒步旅游等需求驱动下,则实现功能复合化、活动多元化转型,如村民组建车队开展环湖导览服务等。在生态治理阶段,旅游市场需求继续塑造空间格局,村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依旧高涨,通过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旅游开发者建设民宿,推动生活空间呈现商业化与现代化特征,但政府严格推行着多级生态保护政策,促使该阶段的空间治理朝着“保护性开发”方向转型。

## 3. 政策规制是引导“三生”功能演变的关键力量

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发展到2018年后的政策严格管控,政策规制在三个阶段中呈现出“宽松—引导—强制”的演变特征,成为空间功能重构的关键驱动力量。在旅游发展初始期,空间演变主要依赖自然地理约束与市场需求的自发调整。在旅游发展高速期,泸沽湖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了全面的治理与改进工作,政府支持泸沽湖旅游发展,使其基础设施和旅游管理得到加强,推动了生活空间向旅游服务场所转型。在生态治理转型期,政策规制从“引导”转向“强制”,通过木质外立面改造、生态红线划定等标准,直接规定空间属性与开发强度。80米生态廊道工程将自然岸线改造为混凝土护岸与木栈道系统,占用耕地与牧场,形成“人工种树、挖潭、补绿”模式,并大量栽种外来植物。政策强制压缩了生产空间的增值功能,引发“保护—开发”的矛盾;综合执法队清理码头、篝火广场等公共空间,政策执行强度直接影响空间功能保留与文化遗产的平衡;且生态保护政策致使生态空间人工化与改善化并存。

## 4. 利益主体的行为博弈是推动“三生”功能微调的直接动因

泸沽湖湖滨带“三生”功能微调与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及博弈存在关联,主要参与方包括本地居民、市场投资主体以及实施监管的政府部门。在旅游发展初始期,利益主体以村民和早期旅游经营者为主,博弈呈现“低强度、高自主性”特征,居民通过木楞房空间改造,在保留居住功能的同时嵌入简易旅游服务,同时此阶段政府干预较少,村民依托周边生态资源,将农牧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进行低强度整合,例如利用山林采集松茸、药材等。这种居民自发调整虽引发空间功能微调,但利益博弈处于温和状态。旅游高速发展期,游客需求激增触发政府、资本与居民的三方博弈。村民为追求经济收益,将生活空间转化为客栈,政府通过规划引导与基础设施投入,推动空间从分散向集聚演变,利益博弈呈现“居民主导改造—政府被动响应”的特征,空间演变速度远超自然调节能力。生态治理期,政府成为主导博弈方,通过80米生态搬迁、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禁止建设活动等政策,压缩居民自主建设空间,生产空间在园林化改造中面临增值功能与生态保护的冲突,此阶段利益博弈呈现“政府强制管控—居民被动适应”的僵化态势,商业空间、公共空间遭受挤压。

## 六、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在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的二维驱动下, 泸沽湖湖滨带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转变表现为“三生”功能的转变, “三生空间”实质上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土地利用形态上的动态映射, 其涵盖的 3 个子系统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相互依存的。而作为典型高原湖泊的泸沽湖, 受地形限制, 其乡村人口聚集规模有限, 旅游资源禀赋形成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 旅游发展生命周期呈现出增速缓慢、起点较低的特征, 且发展进程尚未达到增长峰值便受到生态治理措施的约束。与此同时, 政策执行主体与当地居民利益主体因利益诉求差异产生的博弈互动, 成为影响空间演变的关键变量。自然条件、发展阶段与主体行为的多重作用, 共同塑造了泸沽湖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的独特性。本文采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法分析泸沽湖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主要特征及背后驱动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1) 高原湖泊湖滨区域因高原山地主导的地形特征, 形成“地形约束—生态脆弱”的双重制约机制, 迫使空间演变需在保护优先框架下通过“微更新”实现。

(2) 从不同阶段的“三生空间”演变情况来看, 旅游发展初始期, 泸沽湖湖滨带生活空间的功能以居民生活、居住、交往为主, 且保留着相对自然的原始风貌, 外来干预较少; 生产空间的功能以农耕畜牧为主; 生态空间保留原生“森林—坝子—湖泊”生态系统, 旅游产业虽已起步, 但旅游设施新建极少, 旅游活动对生态空间的干预亦较少, 呈现自然基底主导格局。旅游高速发展期, 泸沽湖湖滨带的生活空间向旅居融合与服务化转变; 生产空间向旅游景观化转变; 生态空间向功能复合化与活动多元化转变。生态治理转型期, 泸沽湖湖滨带的生活空间商业化、现代化、同质化且自主性弱化; 生产空间园林化、景观化, 且增值功能与保护功能冲突; 生态空间扩大化、改善化但人工化倾向明显。

(3) 泸沽湖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是自然环境、旅游市场需求、政策调控、主体行为博弈多因素交织驱动的结果。自然环境限定了湖滨带“三生空间”的基本格局; 旅游市场需求是湖滨带“三生”功能演替的根本动力; 政策规制是引导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的关键力量; 利益主体的行为博弈是推动“三生”功能微调的直接动因。

### (二) 讨论

旅游产业和生态治理的介入, 打破了泸沽湖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地理状态, 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促进泸沽湖整个地域系统的变迁。当前, 泸沽湖的生态治理与保护已取得显著成效, 但处理好泸沽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推进泸沽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本研究针对旅游开发和生态治理二维驱动下的湖滨带旅游空间演变进行了探讨, 是对高原湖泊旅游空间优化的探索性研究。后续将聚焦于湖滨带空间重构路径的探索及其作用机制的解析, 同时关注空间格局演变所引发的生态、社会、经济等多维度影响, 以期为协调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及当地居民生计改善之间的关系, 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路径。

### 参考文献:

- [1] 窦银娣, 叶玮怡, 李伯华,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7): 215-224.
- [2] 张令达, 侯全华, 段亚琼. 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生空间研究: 内涵、进展与对策[J]. 生态学报, 2024(1): 47-59.
- [3] 魏国恩, 刘耀彬, 李汝资, 等. 近 40 年鄱阳湖区“三生空间”格局转型与空间异质机制[J]. 生态学报, 2024(6): 2308-2322.
- [4] 王洪铸. 湖滨带的基本概念(代前言)[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2(增刊 2): 1-2.
- [5] 刘燕. 论“三生空间”的逻辑结构、制衡机制和发展原则[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3): 5-9.
- [6] 江曼琦, 刘勇. “三生”空间内涵与空间范围的辨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4): 43-48, 61.
- [7] 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地理

- 科学进展, 2018(5): 677-687.
- [8] 王成, 唐宁.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J]. 地理研究, 2018(6): 1100-1114.
- [9] 张友成, 潘提提, 陈欣婧, 等.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与优化——以重庆市永川区凉风垭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人民城市, 规划赋能——202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5山地城乡规划). 北京: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23: 10.
- [10] 陶慧, 刘家明, 罗奎, 等. 基于三生空间理念的旅游城镇化地区空间分区研究——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6(2): 153-160.
- [11] 贾琦, 尹泽凯, 刘毅洁, 等. 1980—2020年中原城市群“三生”功能识别及其时空演化[J].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23(2): 12-17.
- [12] 杨清可, 段学军, 王磊,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1): 97-106.
- [13] YANG Y, BAO W, LI Y,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Its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Perspective[J]. Land, 2020(9): 285.
- [14] LIU H, LI S B, ZUO X Y.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Yellow River Basin[J]. Ecologic Economy, 2022(3): 162-180.
- [15] WILLEMEN L, HEIN L, VAN MENSVOORT M E F, et al. Space for people, plants, and livestock? Quantifying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landscape functions in a Dutch rural region[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0(1): 62-73.
- [16] MASTRANGELO M E, WEYLAND F, VILLARINO S H, et al.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and a unifying framework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J]. Landscape Ecology, 2014(2): 345-358.
- [17] 王乐, 熊昌盛, 田宇, 等. 中国“三生”空间功能异质性评价、时空演变及分区调控[J]. 农业工程学报, 2024(10): 265-275.
- [18] 刘一辉, 高培超, 孙筱敏, 等. 广东省“三生”空间冲突评价与多尺度影响因素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6): 819-830.
- [19] 徐治明, 董晔, 闫伊亮. 乌鲁木齐市“三生空间”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研究[J]. 生态科学, 2024(4): 47-57.
- [20] 邱孟龙, 付梦雨, 李逍遥, 等. 基于功能偏离的脱贫山区“三生”空间冲突识别及其演变特征——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J]. 生态学报, 2025(8): 1-13.
- [21] 卢中辉, 王婉乐, 张莹, 等. 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评价及耦合协调性分析[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1): 35-44.
- [22] 李鹏, 叶帅, 赵敏,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洱海湖滨带三生功能演变特征及机理[J]. 资源科学, 2023(8): 1647-1661.
- [23] 杨小飘, 赵宇鸾, 吴强, 等. 高铁驱动下的山区民族旅游型村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J]. 生态科学, 2024(4): 176-186.
- [24] 沈彦, 张伟娜, 张明.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的城市群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长株潭城市群的实证研究[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2(2): 73-82.
- [25] 廖艳梅, 尹林江, 韩敏, 等. 贵州省风景名胜区“三生”空间功能演化及生态效应[J]. 水土保持通报, 2024(3): 212-220, 306.
- [26] 杨燕, 胡书玲, 王坤, 等. 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三生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以肇兴侗寨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12): 222-230.
- [27] 李琛, 吴映梅, 高彬, 等.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4): 220-229.
- [28] 叶春, 李春华, 邓婷婷. 论湖滨带的结构与生态功能[J]. 环境科学研究, 2015, 28(2): 171-181.
- [29] 陈刚.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泸沽湖地区摩梭社会文化变迁[J]. 民族论坛, 2012(22): 31-39, 47.
- [30] 陈刚. 发展人类视野中的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以云南泸沽湖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09(3): 163-171.
- [31] 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宁蒗彝族自治县志[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184, 447.
- [32] 金鑫. 云南宁蒗县泸沽湖传统村落保护研究[D]. 昆明: 西南林业大学, 2013.
- [33] 梁琰. 旅游影响下泸沽湖景区民族村寨空间演变与共生发展路径研究[D]. 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 2020.
- [34] 习婷婷. 风景旅游村的共生模式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1.
- [35]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丽江玉龙雪山风景名胜区泸沽湖景区详细规划[R]. 昆明: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
- [36] 蒋尚坤. 湘湖旅游度假区“三生”空间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D]. 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 in the Lakeside Zone of Lugu Lake in Yunnan Province und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LIU Hongfang, WANG Jiaying, ZHAO Y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lakeside zone of plateau lakes is not only a densely populated area for local residents' production and living activities, but also a key zon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a typical area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 Taking Lugu Lake in Yunna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 evolution in its lakeside zone under the dual-driven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behind it. The study finds that: (1) Due to the top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dominated by plateau mountains, the lakeside zone of plateau lakes forms a dual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ecological sensitivity,” forcing spatial evolution to be achieved through “micro-renewa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priority; (2)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living space mainly guarantees the core functions of residents' living, residing, and interaction; the production space is mainly focused on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ecological space retains the original “forest-dam-lake” system, presenting a natural-based dominant pattern; (3) Dur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of tourism, the living space transitions towards integration and service-oriented transformation, the production space towards tourism landscaping, and the ecological space towards functional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ed activities; (4)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 lakeside zone's living space becomes commercialized, modernized, homogenized, and subjectivity weakened, the production space becomes garden-like and landscaped, with conflicts between value-added and protective functions; the ecological space expands and improves, but artificial landscaping is evident. (5)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the lakeside zone of Lugu Lake is driven by a complex interpla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ourism market demand, policy regulations, and behavioral games among stakeholders. This study can supplement case studies on micro-level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plateau lakes under the dual goals of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plateau lake;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 ecological sensitivity; ecologic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李文瑛)